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第二輯

沈衛榮題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沈衛榮 主編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王堯先生近影

謹以此輯恭賀王堯先生八十華誕
Dedicated to Prof. Wang Yao's 80th Birthday

本刊獲華民慈善基金支持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第三輯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沈衛榮 主編

科學出版社

北京

內 容 簡 介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學術刊物。以介紹國內外學者關於中國西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歷史、語言、考古、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為主要宗旨。發表具有原創性的學術研究論文、書評和研究綜述等，以期推動國內學界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方面的進步。

本書適合於從事中國西北邊疆地區民族語言、歷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和相關專業的大專院校師生參考閱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第3輯 / 沈衛榮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03-027125-9

I. 西… II. ①沈…②中… III. 西域-語言學史-文集 IV. H172.2-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56682 號

責任編輯: 孫 莉 郝莎莎 / 責任校對: 張 琪

責任印製: 趙德靜 / 封面設計: 王 浩

科學出版社 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街 16 號

郵政編碼: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印刷

科學出版社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

2010 年 5 月第 一 版 開本: 787 × 1092 1/16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 25 3/4 插頁: 1

印數: 1—1 600 字數: 610 000

定價: 80.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我社負責調換)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No. 3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en Weirong Editor-in-Chief

Science Press
Beijing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

- 主辦 中國人民大學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主編 沈衛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編委 王炳華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烏雲畢力格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沈衛榮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 黃朴民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 孟憲實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 孫家洲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 魏 堅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 成崇德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 羅 豐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 榮新江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 劉迎勝 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
- 余太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達力扎布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 朱玉麒 新疆師範大學文學院
- 吳玉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張德芳 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
- 李 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
- 松川節 日本大谷大學文學部
- 杉山正明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
- 荒川慎太郎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研究所
- Max Deeg 英國卡迪夫（Cardiff）大學宗教系
- Kirill Solonin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研究系
- Ruth Dunnell 美國肯揚（Kenyon）學院歷史系
- Peter Schwieger 德國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學系
- 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瑞士伯爾尼大學宗教系
- Lhamsurunginn Khurelbaatar 蒙古國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

目 録

王堯教授歷年論著目錄	任小波 編 (1)
Tib. <i>Ma rdum pa</i> —a Phantom Name	Ernst Steinkellner (15)
吐谷渾的藏文拼寫、藏文名稱及其阿爾泰語源	卓鴻澤 (17)
古代チベットの会計と支出処理：IOL Tib J 897の事例より	岩尾一史 (33)
敦煌チベット語文献 P. T. 239 表訳注——古代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前仏教的葬儀と その仏教化に関する一証言—	石川巖 (55)
Tibetan Manuscripts Preserved by the Cultural Relics Office of Hengshan, Hunan Province	Saerji (75)
The Tibetan Expression “bod Wooden Door” (bod shing sgo) and its Probable Mongol Antecedent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89)
Chos-rgyal 'Phags-pa's Advice to A Mongolian Noblewoman	Matthew T. Kapstein (135)
Prolegomena to Tibetan Folk Literature and Popular Poetic Idiom: Scope and Typology	Per K. Sørensen (145)
Black Magic in Tibetan Buddhism	Peter Schwiieger (169)
薩珊人在東方：一批來自阿富汗北部的大夏語檔案	
..... 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著；周利群譯 (187)	
梵語《賢劫經》殘卷——兼述《賢劫經》在古代于闐的傳佈及竺法護的譯經風格	段晴 (201)
Resetting the Diamond Reflections on Kumārajīva'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i>Vajracchedikā</i> (“ <i>Diamond Sūtra</i> ”)	Paul Harrison (233)
Defining An Shigao's 安世高 Translation Corpu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Relevant Research	Stefano Zacchetti (249)
An Uighur Instruction Document for Preaching the <i>Bayangjing</i> and Other Sutras in Alliterating Verses from Shanxi	Peter Zieme (271)
The Grammatical Training of <i>Guṇaprabha</i> —Analysis of VS-1. 22	Luo Hong (283)

Padhānasutta: 佛傳中降魔悟道的起源——對巴利文、梵文及漢譯佛典的比較考察	張麗香 (289)
從《突厥語大詞典》看突厥語族語言的動詞語態的交叉重疊	買提熱依木·沙依提 (311)
“佛頂尊勝陀羅尼”敦煌藏文本版本研究	李建強 (321)
The <i>dhāraṇīs</i> in Lantsa Script in Emperor Qianlong’s Tomb; A Preliminary Inventory	Françoise Wang-Toutain (343)
關於內齊托音喇嘛相關的順治朝滿文題本	烏雲畢力格 (375)

Contents

List of Prof. Wang Yao's Publications	Ren Xiaobo(1)
Tib. Ma rdum pa—A Phantom Name	Ernst Steinkellner(15)
The Spelling and Name of “Tuyühu” in Tibetan as well as its Source in Altaic Language	Hoong Teik Toh(17)
Expenditure accounting in the Old Tibetan Empire: according to a D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 (IOL Tib J 897)	Iwao Kazushi(33)
bsNgo ba (P. T. 239 recto)—An Evidence for Pre-Buddhist Funeral and Its Buddhicisation in Ancient Tibet—	Ishikawa Iwao(55)
Tibetan Manuscripts Preserved by the Cultural Relics Office of Hengshan, Hunan Province	Saerji(75)
The Tibetan Expression “bod wooden door” (bod shing sgo) and its Probable Mongol Antecedent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89)
Chos-rgyal 'Phags-pa's Advice to a Mongolian Noblewoman	Matthew T. Kapstein(135)
Prolegomena to Tibetan Folk Literature and Popular Poetic Idiom: Scope and Typology	Per K. Sørensen(145)
Black Magic in Tibetan Buddhism	Peter Schwieger(169)
The Sasanians in the East: A Bactrian Archive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Sims-Williams, Nicholas(187)
A fragment of Bhadrakalpasutra-wit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this Sutra in Ancient Khotan	Duan Qing(201)
Resetting the Diamond Reflections on Kumārajīva'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Vajracchedikā (“Diamond Sūtra”)	Paul Harrison(233)
Defining An Shigao's 安世高 Translation Corpu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Relevant Research	Stefano Zacchetti(249)
An Uighur Instruction Document for Preaching the Bayangjing and Other Sutras in Alliterating Verses from Shanxi	Peter Zieme(271)
The Grammatical Training of Guṇaprabha—Analysis of VS-1. 22	Luo Hong(283)
Padhānasutta: The Origin of the Māravijaya in the Buddha Legend—A Comparison of the Pāli-, Sanskrit- and Chinese Texts	Zhang Lixiang(289)
A Discussion on the Crossing and Overlapping in Turkic Verb Voice based on the Old Turkic Documents (Dīwān Lurūt at-Turk)	Muhammatrahim Sait(311)

A Research on Versions of the D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of <i>Uṣṇiṣṇavijayadharāṇi</i>	Li Jianqiang (321)
The <i>dhāraṇis</i> in Lantsa Script in Emperor Qianlong's Tomb: A Preliminary Inventory	Françoise Wang-Toutain(343)
The Manchu Documents about neyiči toyin Lama in <i>Tiben</i> of Shunzhi Reign	Borjigidai Oyunbilig(375)

王堯教授歷年論著目錄

任小波 整理

(一) 論文、雜文

1956 年

《藏語的聲調》，《中國語文》1956 年第 6 期。

1957 年

《西藏諺語俗語選》，《民間文學》1957 年第 1 期。

1958 年

《藏語數詞中的“墊音”》，中國語文雜誌社編：《少數民族語文論集》第 2 集，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

1962 年

《藏族史劄記》，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科學討論會論文匯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62 年。

《略談西藏民歌中的諧係民歌》，《民間文學》1962 年第 2 期。

1963 年

《藏文大藏經（西蕃字藏）述略》，藏族研究班專題講座講稿，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63 年。

1965 年

《薩迦世系、帕竹世系》，王森：《關於西藏佛教的十篇資料》附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65 年。

1978 年

《西夏黑水橋碑考補》，《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 年第 1 期。

《薩迦班智達公哥監藏致蕃人書》，韓儒林主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3 輯，南京：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組，1978 年。

1979 年

《黃河源上兩大湖——扎陵、鄂陵名稱位置考實》，《社會科學戰綫》1979 年第 3 期。

《喇嘛教對藏族文化的影響》，《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79 年第 3、4 期。

《藏文》，《民族語文》1979 年第 1 期。

《藏戲和藏戲故事——西藏文化巡禮之一》，《西藏文藝》1979 年第 3 期。

《〈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中的藏族古代歌謠——西藏文化巡禮之二》，《西藏文藝》1979 年第 4 期。

《西藏訪書簡記》，《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 年第 9 期。

《〈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序言》，王堯、陳踐：《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西寧：青海民族學院，1979 年。

1980 年

《吐蕃佛教述略》，《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0 年第 4 期。

《藏族翻譯家管·法成對民族文化交流的貢獻》，《文物》1980 年第 7 期。

《第巴·桑結嘉錯雜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究集》第 1 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 年。

《藏文古代歷史文獻述略》，《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0 年第 2 期。

《史傳文學及〈米拉日巴傳〉——西藏文化巡禮之三》，《西藏文藝》1980 年第 2 期。

《〈薩迦格言〉評價——西藏文化巡禮之四》，《西藏文藝》1980 年第 3 期。

《對音譯轉寫地名的一點補充意見》，《民族語文》1980 年第 2 期。

1981 年

《南宋少帝趙顯遺事考辨》，《西藏研究》1981 年第 1 期。

《山東長清大靈岩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釋》，《文物》1981 年第 11 期。

《藏語 mig 字古讀考——兼論藏語聲調的發生與發展》，《民族語文》1981 年第 4 期。

《〈苯教史〉漢譯本導言》（噶爾美撰，與陳觀勝合譯），《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1 年第 3 期。

1982 年

《吐蕃文獻學概述》，王堯：《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

《P. T. 1283 號〈北方若干國君之王統叙記〉文書》（與陳踐合撰），《敦煌學輯刊》1982 年第 2 期。

《〈于闐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寫卷 P. T. 960 號譯解》（與陳踐合撰），《西北史地》1982 年第 3 期。

《敦煌藏文寫卷 P. T. 986 號〈尚書〉譯文証補》（與陳踐合撰），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藏族研究論文集》第 1 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1982 年。

《敦煌本藏醫學殘卷介紹（上）》（與陳踐合撰），《中華醫史雜誌》1982 年第 4 期。

《紀念中孟人民的友誼使者、孟加拉族佛教學者阿底夏大師》，《南亞研究》1982 年第 3 期。

《承德〈安遠廟碑〉考釋》，《法音》1982 年第 3 期。

1983 年

《敦煌古藏文〈禮儀問答〉寫卷譯解》（與陳踐合撰），《西北史地》1983 年第 2 期。

《敦煌吐蕃文書 P. T. 1291 號〈戰國策〉藏文譯文証補》（與陳踐合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3 年第 3 期。

《敦煌古藏文〈羅摩衍那〉譯本介紹》（與陳踐合撰），《西藏研究》1983 年第 1 期。

《敦煌本藏醫學殘卷介紹（下）》（與陳踐合撰），《中華醫史雜誌》1983 年第 2 期。

《遼刻〈契丹藏〉發微》，《中國歷史文物》1983 年第 1 期。

《再論民族民間文學與宗教的關係》（與馬學良合撰），《西藏文學》1983 年第 2 期。

1984 年

《吐蕃文獻叙錄》，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敦煌藏文寫卷 P. T. 1083、1085 號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時期的民族關係探索》（與陳踐合撰），《歷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

《嘉木樣協巴》，王思治主編：《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 1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研究近況綜述》，朱東潤、李俊民、羅竹風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 3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1985 年

《吐蕃時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 P. T. 1047、1055 號譯釋》（與陳踐合撰），《世界宗教研究》1985 年第 3 期。

《吐蕃的鳥卜研究——P. T. 1045 號卷子譯解》（與陳踐合撰），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藏學研究文集》第 3 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年。

《唐撥川郡王事迹考——吐蕃大相祿東贊嫡孫仕唐故實》，朱東潤、李俊民、羅竹風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 3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西藏佛教及教派簡介》，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藏學研究文集》第 3 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藏語西部方言——巴爾提（Balti）話簡介》，《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

《〈苯教史〉（嘉言寶藏）選譯（一）》（噶爾美著，與陳踐合譯），王堯主編：《國外藏研究譯文集》第1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介紹〈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辭典〉及其主編于道泉教授》，《辭書研究》1985年第3期。

《回顧與前瞻——記中央民族學院的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與陳踐合撰），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藏學研究文集》第3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1986年

《吐蕃兵制考略——軍事部落聯盟剖析》（與陳踐合撰），《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從一張借契看宗教的社會作用——P. T. 1297（1）號敦煌吐蕃文書譯解》（與陳踐合撰），《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敦煌本〈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藏漢對照詞彙考證校錄》（與陳踐合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2期。

《敦煌吐蕃寫卷〈醫馬經〉、〈馴馬經〉殘卷譯釋》（與陳踐合撰），《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

《新疆吐蕃簡牘考述及釋例》，王堯、陳踐：《吐蕃簡牘綜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藏族的古歌與神話》，《青海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

《藏文大藏經——麗江一理塘版〈甘珠爾〉經述略》，《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

《〈紅樓夢〉第63回中的“土番”正解》，中國曹雪芹研究會編：《曹學論叢》，石家莊：群眾出版社，1986年。

1987年

《有關吐蕃法制的三件敦煌文書譯釋》（與陳踐合撰），《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4期。

《P. T. 1188號〈登里回鶻可汗告牒〉譯釋》，《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

《歸義軍曹氏與于闐之關係補證——P. T. 1284號吐蕃文書譯釋》（與陳踐合撰），《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三探吐蕃卜辭——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藏文占卜文書譯釋》（與陳踐合撰），《青海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

《吐蕃飲饌與服飾》，馬雍主編：《中亞學刊》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苯教史〉(嘉言寶藏)選譯(二)》(噶爾美著,與陳觀勝合譯),王堯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2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西藏的鬼怪和神靈〉再版導言》(博·克瓦爾內著,王堯譯),王堯主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3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88年

《蕃占期間的敦煌佛教事業探微——P. T. 999、1001號藏文寫卷譯釋》(與陳踐合撰),《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試論藏族的史學和藏文史籍》(與沈衛榮合撰),《史學史研究》1988年第2、3期。

《摩挲遺文憶前賢——記顧頡剛先生序〈五鳳苑藏漢字典〉》,藏族史論文集編輯組編:《藏族史論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張建木先生所譯〈印度佛教史〉讀後贅語》,多羅那它:《印度佛教史》附錄,張建木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西藏問題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88年第4期。

1989年

《吐蕃的王權與官制考略》,藏學研究文選編輯組編:《藏學研究文選——祝賀王森先生從事藏學研究工作50週年》,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吐蕃職官考信錄》(與陳踐合撰),《中國藏學》1989年第1期。

《敦煌吐蕃官號“節兒”考》,《民族語文》1989年第4期。

《藏漢佛典對勘釋讀之一——〈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

《藏漢佛典對勘釋讀之二——〈金剛經〉》,《西藏研究》1989年第4期。

《藏曆圖略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陳寅恪先生對我國藏學研究的貢獻》,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組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

《藏學研究在臺灣》,《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

《考釋蕃文開盛業,征研元史見和光——序〈仁慶扎西藏學研究文集〉》,仁慶扎西:《仁慶扎西藏學研究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評介》,《書品》1989年第1期。

1990年

《馬球(polo)新証》,《法言》(香港)1990年第8期。

《〈涼州廣善寺碑〉藏漢文釋讀》(與陳踐合撰),《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藏漢佛典對勘釋讀之三——〈大乘無量壽宗要經〉》,《西藏研究》1990年第

2 期。

《藏漢佛典對勘釋讀之四——〈佛說阿彌陀經〉》，《西藏研究》1990 年第 4 期。

《奈巴教法史——古譚花鬘》（奈巴班智達著，與陳踐合譯），《中國藏學》1990 年第 1 期。

《中國的藏學》，湯一介主編：《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1988 年》，北京：三聯書店，1990 年。

《悵望雪山悲遺志，俯首幽燕哭斯人——悼念郎卡孜·羅桑多吉》（與徐盛合撰），《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0 年第 3 期。

1991 年

《敦煌 P. T. 351 號吐蕃文書及景教文獻叙錄》，漢學研究中心編：《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 年。

《青海吐蕃簡牘考釋》（與陳踐合撰），《西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

《宗喀巴思想的歷史淵源》（與褚俊杰合撰），《中國藏學》1991 年第 3 期。

《書卷縱橫崇明德，山河帶礪燦晚霞——評王森先生〈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藏學》1991 年第 2 期。

《匈牙利藏學泰斗 G. 烏瑞教授逝世》，《中國藏學》1991 年第 4 期。

1992 年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導言》，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年。

《藏傳佛教譯經史料鉤沉》，《中國藏學》1992 年第 3 期。

《薩迦班智達貢噶堅參及其哲理詩〈薩迦格言〉》，王堯：《西藏文史考信集》，高雄：佛光出版社，1992 年。

《緣起不能破——宗喀巴對中觀緣起學說的肯定》（與褚俊杰合撰），中華佛學研究所編：《中華佛學學報》第 5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2 年。

《漢經融藏典，教理叩禪關——頌太虛大師創辦漢藏理教院的偉大貢獻》，王堯：《藏學零墨》，高雄：佛光出版社，1992 年。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再版前言》，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年。

《〈國外敦煌吐蕃文書研究選譯〉前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編：《國外敦煌吐蕃文書研究選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中譯本跋尾》，〔法〕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耿昇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

1993 年

《〈賢愚因緣經〉藏文本及其譯者小考》，王宗維、周偉洲編：《馬長壽紀念文

集——紀念馬長壽教授誕辰 85 週年逝世 20 週年》，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 年。

《山東長清大靈岩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釋補証》，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編：《藏學研究》第 7 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 年。

《摩訶葛刺（Mahākāla）崇拜在北京》，蔡美彪主編：《慶祝王鍾翰先生 80 壽辰學術論文集》，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 年。

《少數民族與道教——讀史劄記》，戴慶廈、羅美珍、楊應新編：《民族語文論文集——慶祝馬學良先生 80 壽辰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 年。

《臺灣近期藏學論著述評》，《中國西藏》1993 年第 2 期。

《〈西藏的神靈和鬼怪〉中譯本序言》，〔奧地利〕勒內·德·內貝斯基·沃杰科維茨：《西藏的神靈和鬼怪》，謝繼勝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994 年

《從兩件敦煌吐蕃文書來談洪辯的事迹——P. T. 999、1201 號卷子譯解》，復旦大學中文系編：《選堂文史論苑——饒宗頤先生任復旦大學顧問教授紀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清廷治藏盛事有見証——介紹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幾件藏傳佛教文物》，《中國西藏》1994 年第 6 期。

《〈喇嘛王國的覆滅〉中譯本序言》，〔美〕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杜永彬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年。

1995 年

《元廷所傳西藏秘法考叙》，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 3 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 年。

《從“河圖洛書”、“陰陽五行”、“八卦”在西藏看古代哲學思想的交流》，饒宗頤主編：《華學》第 1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年。

《〈金瓶梅〉與明代道教活動》，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7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宗喀巴評傳〉序言及後記》，王堯、褚俊杰：《宗喀巴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996 年

《從“血親復仇”到“賠償命價”看藏族的傳統思想與社會變遷》，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 8 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

《藏族四大詩人（米拉日巴、薩迦班智達、宗喀巴、倉央嘉措）合論》（與褚俊杰合撰），饒宗頤主編：《華學》第 2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 年。

《作為哲學家的宗喀巴和宗喀巴的中觀哲學》（與褚俊杰合撰），陳慶英主編：《藏族歷史宗教研究》第 1 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 年。

《宗喀巴的密宗思想——“雙運論”與“次第論”》（與褚俊杰合撰），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編：《藏學研究》第8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年。

《藏語 zla ba 一詞音義考》，《民族語文》1996年第5期。

《梟（sho）、博（sbag）考源——西藏民間娛樂文化探討》，《中國藏學》1996年第2期。

《十一世班禪大師應化現身追記》，《炎黃春秋》1996年第6期。

《〈風馬考〉代序》，謝繼勝：《風馬考——西藏民間宗教、儀軌與神話》，臺北：唐山書局，1996年。

1997年

《〈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編輯緣起及後記》（與陳楠合撰），王堯主編：《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題萬松圖〉的故事》，《佛教文化》1997年第5期。

1998年

《敦煌吐蕃文書 P. T. 1297 號再釋——兼談敦煌地區佛教寺院在緩和社會矛盾中的作用》，《中國藏學》1998年第1期。

《藏語的文化語言學釋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

《〈西藏歷史文化辭典〉前言》，王堯、陳慶英主編：《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寧瑪派次第禪〉序言》，摧魔洲尊者：《寧瑪派次第禪》，敦珠寧波車科判、談錫永導論、許錫恩翻譯，香港：密乘佛學會，1998年。

《〈藏史叢考〉序言》，陳楠：《藏史叢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

1999年

《賓人初考——藏族與道教的關係一探》，王堯主編：《賢者新宴——藏學研究叢刊》第1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我與西藏學》，張世林編：《學林春秋》第2編，北京：朝華出版社，1999年。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序言》，王堯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賢者新宴〉創刊序言》，王堯主編：《賢者新宴——藏學研究叢刊》第1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敦煌漢文吐蕃史料輯校〉序言》，楊富學、李吉和：《敦煌漢文吐蕃史料輯校》第1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序言》，王啓龍：《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瀟灑無塵，耿介絕俗，崎嶇歷盡，書生面目——為費孝通老師90大壽獻詞》，張

榮華編：《薪火相傳——記費孝通教授》，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

2000年

《吐蕃時期藏譯漢籍名著及故事》，王堯：《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藏傳佛教經典叢談》，王堯：《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詩人、聖者米拉日巴的自然雅趣與性瑜伽觀》，王堯：《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明初與藏事有關的詔文及河西碑刻考異》，王堯：《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金瓶梅〉與明代藏傳佛教》，王堯：《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一件駐藏大臣奏摺介紹——嘉慶治藏政策平議》，王堯：《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古藏文概述及圖例》，王堯：《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千江映月，同是一月——〈解深密經疏〉遺事掇瑣》，韓金科主編：《'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近十年中國藏學研究概述（1986—1996）》，王堯：《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更敦群培評傳〉序言》，杜永彬：《二十世紀西藏奇僧——人文主義先驅更敦群培大師評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

《藏學研究與外宣工作之淺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

2001年

《雲南麗江吐蕃古碑釋讀劄記》，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大寶積經〉漢藏文對勘校讀本述略前記》，胡軍、孫尚揚主編：《詮釋與建構——湯一介先生75週年華誕暨從教50週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藏譯本〈大唐西域記〉的翻譯、譯者和大乘上座部等幾個問題述記》，樂黛雲主編：《季羨林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紀念季羨林教授90壽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特立異行，追求真理——記我所知道的先師于道泉先生》，王堯編著：《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于道泉先生年譜簡編》，王堯編著：《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兩位學術大師：周叔迦與于道泉》，湛如主編：《華林》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早期漢藏藝術〉中漢譯本序言》，〔法〕噶爾美·海瑟：《早期漢藏藝術》，熊文彬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002年

《吐蕃古史探微——神話、傳說、故事與寓言》（與褚俊杰合撰），陳高華、余太山主編：《中亞學刊》第6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從敦煌文獻看吐蕃文化》，黃征主編：《南京栖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

《〈藏學文庫〉總序》，王堯主編：《藏學文庫》，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雪域舊旅叢書〉總序》，王啓龍主編：《雪域舊旅叢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2003年

《唐帝國統治下的西域與吐蕃王國》（與穆舜英合撰），〔俄〕B. A. 李特文斯基主編：《中亞文明史》第3卷，馬小鶴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3年。

《〈中國藏學史〉序言》，王堯、王啓龍、鄧小咏：《中國藏學史：1949年前》，北京：民族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吐蕃文獻選讀〉序言》，陳踐、王堯：《吐蕃文獻選讀》，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

《記與王重民先生交往二三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文津流觴》第11期，2003年。

《高山仰止——長憶李方桂先生》，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附錄，王啓龍、鄧小咏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2004年

《青海玉樹地區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釋讀》，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拉薩尼寺梵唄〉序言》，黃勇：《拉薩尼寺梵唄——阿尼倉空宗教儀軌供品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

2005年

《青海都蘭新出吐蕃文匯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蘭吐蕃墓》附錄，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

《〈藏族與長江文化〉序言》，王堯、黃維忠：《藏族與長江文化》，武漢：湖北教

育出版社，2005年。

2006年

《蹉跎歲月裏的輔仁》，李麗主編：《王輔仁與藏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

2007年

《吐蕃“鉢闡布”考論》，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編：《藏學學刊》第3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

《西藏地名釋例》，唐曉峰主編：《九州》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藏漢文化的雙向交流》，陸挺、徐宏主編：《人文通識演講錄·歷史卷》，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藏族為中華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楊君採訪），《中國宗教》2007年第12期。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漢譯本序言》，丁邦新主編：《李方桂全集》第9卷，王啓龍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

《〈圖說西藏古今〉序言》，廖東凡、張曉明、周愛明、陳宗烈：《圖說西藏古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年。

《我陪耀邦書記進藏側記》，胡耀邦史料信息網，2007年7月30日。

2008年

《文化的認同和融合——漢藏文獻互譯淺見》，北京：國際藏學討論會，2008年。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三版前言》，王堯、陳踐：《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儒雅博學，熱愛祖國——長憶柳陞祺先生》，郝時遠、格勒主編：《紀念柳陞祺先生百年誕辰暨藏族歷史文化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

2009年

《藏傳佛教與靈童轉世》，《中國文化》2009年第3期。

《長安佛教與西藏佛教》，西安：長安佛教論壇，2009年。

（二）專著、合著

《西藏民間故事》，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5年。

《說不完的故事》，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6年；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62年、1980年。

《文成公主的故事》，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1956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8年。

- 《珍珠》（與開斗山合著），北京：通俗文藝出版社，1957年。
- 《蒙藏民間故事》（與李翼合著），香港：今代圖書公司，1957年。
- 《西藏薩迦格言選》，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1981年。
- 《藏劇故事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3年；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英文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6年。
- 《藏族民間故事選》（與佟錦華合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
-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與陳踐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增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 《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 《吐蕃文獻選讀》（與陳踐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敦煌吐蕃文獻選》（與陳踐合著），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 《吐蕃簡牘綜錄》（與陳踐合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 《吐蕃時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寫卷譯釋》（與陳踐合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年。
- 《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與陳踐合著），漢藏合刊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 《吐蕃文化》，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 《西藏文史考信集》，高雄：佛光出版社，1992年；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
- 《藏學零墨》，高雄：佛光出版社，1992年。
- 《宗喀巴評傳》（與褚俊杰合著），臺北：東初出版社，1992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中國地域文化·藏文化卷》（與丹珠昂奔合著），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7年。
- 《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臺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 《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中國藏學史：1949年前》（與王啓龍、鄧小咏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 《藏學概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 《西藏文史探微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
- 《藏族與長江文化》（與黃維忠合著），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與陳踐合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三) 主編、參編

《國外藏學研究選譯》，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3年。

《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于道泉主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1—18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2006年。

《藏漢大辭典》（張怡蓀主編），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

《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西藏歷史文化辭典》（與陳慶英合作主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華文化通誌·民族文化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賢者新宴——藏學研究叢刊》（第1—5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5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佛教小辭典》（杜繼文、黃明信主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

《中國佛教文化大觀》（方廣錫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藏學文庫》，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2008年。

《李方桂全集·古代西藏碑文研究》（與柯蔚南合作主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

Tib. Ma rdum pa—A Phantom Name

Ernst Steinkellner

That I dare to contribute the following short note to this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Wang Yao is only due to being certain that the celebrate will know that an even mor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could not sufficiently reflect my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or his lifelong scholarly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my great affection for the friend of many years.

The name in question occurs in two forms, *Ma rdum pa* and *Ma rdum*, in the translation of Dignāga's *Pramāṇasamuccayavṛtti* by Vasudhararakṣita and Señ rgyal,^① and represents the name of the famous Sāṅkhya teacher Mādhava. Hattori considers this Tibetan representation to be “a wrong transliteration of Mādhava”^②. The Tibetan form of the name is certainly a transliteration, for as a translation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However, I believe that it was not originally an incorrect transliteration, but rather that it was the result of a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mission which started with a correct transliteration of the name.^③

A clue to the possible process of this development can be found in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Jinendrabuddhi's *Pramāṇasamuccayaṭīkā*.^④ Here we find the correct transliteration *mā dha ba* (P75a3,6; D66b4, pa in 6), as well as *ma dha ba* (P77a8 ; *mā dha ba* D68b4), but one also finds *ma dhu ba* (P74b4) and *ma dhu pa* (D66a6).

Taking this as a clue, I feel confident in proposing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for the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is name's originally correct transliteration. Unattested stages of this assumed development are in brackets.

1. *mā dha ba*

2. (*ma dhā ba*); by shifting the subscript *a chuñ*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syllable.

① *Ma rdum pa* D23b2, C23b1 ; *Ma rdum* P23b3, N 24a (after Masaaki Hattori, *Dignāga, On Perception, being the Pratyakṣapariccheda of Dignāga's Pramāṇasamuccaya from the Sanskrit fragments and the Tibetan versio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18, 14). The name does not appear in the translation by Kanakavarman and Dad pa'i Śes rab.

② Hattori, *loc. cit.*, note 5. 40.

③ If I had easy access to all the Tanjur editions and manuscripts available, I would have tried to find examples for this development. But given the reasonably certain hypothesis for such a development presented below, I hope my colleagues in the field will pardon this deliberate negligence.

④ P (Tokyo-Kyoto, 1955-1961, Nr. 5766), D (Tokyo 1977ff, Nr. 4268).

3. *ma dhu ba* :by misreading the subscript *a chuñ* for subscript *u*.
4. (*ma rdu ba*) :by misreading *dhu* for *rdu*.
5. (*ma rdum*) :by misreading *b* for *m* and attaching the latter to the second syllable.
6. *ma rdum pa* :by restoring a name form in *pa*.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 ལྷ་ལྷ་ལའི་

When reproduced in the scripts of the beautifully designed fonts now available,^⑤ these steps of gradual change may not appear so evident, and it is, of course, difficult to decide whether all of them or which ones individually occurred in the process of copying manuscripts or prints, or both. With a view to the date “late eleventh or early twelfth century”^⑥ for the translation by Vasudhararaksita and Señ ge rgyal po, long before the printed Tanjur editions that we are used to, we have to think of manuscripts and copies in *dbu med* script primarily, as well as of a sequence of scribal mistakes and corrections.^⑦ In any case, it seems sufficiently clear that the name *Ma rdum pa* is not a candidate for a future Tibetan onomasticon.

⑤ I used the fonts CTCRC-Uchen, CTCRC-Betsu and CTCRC-Tsumachu, and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kindly making these fonts available to me.

⑥ Hattori, *loc. cit.*, p. 13.

⑦ For pertinent observations on comparable mistakes in the Tanjur transmission cf. Helmut Eimer, “Überlegungen zur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tibetischen Buddhacarita,” in: *Essays and Studies o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Dedicated to Claus Vogel by Colleagues, Students and Friends*. Ed. Dragomir Dimitrov, Michael Hahn, and Roland Steiner,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2008, pp. 65-77, as well as Kurtis R. Schaeffer, *Dreaming the Great Brahm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7-108.

吐谷渾的藏文拼寫、藏文名稱及其阿爾泰語源

卓鴻澤

一、Tho gon

今藏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 (India Office Library)、舊屬印度事務部圖書館 (India Office Library 藏品之古藏文寫卷) ITJ 1368 爲吐谷渾史事紀年, 中有 [th]o gon kha gan, ma ga tho gon kha gan 等專名^①, 似相當於“吐渾可汗”、“莫何吐渾可汗”。《舊唐書·高宗本紀》上元二年 (675):

[正月] 辛未, 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 不許。

《新唐書·吐蕃傳上》:

上元二年, 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 且求與吐谷渾脩好, 帝不聽。

按: 吐渾彌當爲涼州界吐渾部落中党項羌人, 降於吐蕃, 封官爲“論” (藏文 blon), 爲吐蕃辦理吐谷渾事務, “彌”似爲党項羌語 *mi 或 *mer^②。“吐渾”即東晉時鮮卑 (*Šerpi, *Šerβi) 語“吐谷渾”在唐代的新譯。但後世的古典藏文著述有時據漢文“吐谷渾”譯寫爲 Thu lu hun, 法國伯希和 (Paul Pelliot) 以其晚出, 未加珍視, 而將“吐谷渾”的原型擬爲 *Tu'uy-γun (Tuyuy-γun) ~ *Tu'uyun (Tuyuyun)^③。

誠然, 儘管中土傳讀並非一致無訛, 但具有西域背景的慧琳 (737—820) 在《一切經音義》中亦注“谷”字“音欲”^④, 有此權威音注執爲成見, 鮮不以藏文 lu 爲 yu 之形訛。所以晚近辭書與研究論著, 凡涉及藏文 Thu lu hun 之處, 大抵訂爲 Thu yu hun。此一字之異, 似於唐代羌、渾歷史無關宏旨, 可置勿論, 而實與金、元之際河西地區史學之傳播不無關係, 請試論之。

① 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1, Vol. 2, pp. 8-16. Lucie no Petech, “Nugae Tibeticae”,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31, (1956), pp. 291-294. Géza Uray, “The annals of the 'A-ža Principality: the problems of chronology and genre of the Stein document, Tunhuang, vol. 69, fol. 84”, in Louis Ligeti ed., *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őrös Memorial Symposium held at Mátrafüred, Hungary, 24-30 September 1976*,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8, pp. 541-578.

② 參看《舊唐書·党項羌傳》: “有羌酋拓拔赤辭者, 初臣屬吐谷渾, 甚爲渾主伏允所暱, 與之結婚。及貞觀初, 諸羌歸附, 而赤辭不至。李靖之擊吐谷渾, 赤辭屯狼道坡以抗官軍。”《舊唐書·杜佑傳》載佑上疏有“党項與西戎 (按: 謂吐蕃) 潛通, 屢有降人指陳事跡”之語。又突厥頡利可汗母家有家臣名吐渾邪, 參注 21。

③ Paul Pelliot, “Notes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 *Toung pao* 20 (1921): 323-31. 卜弼德 (Peter A. Boodberg) 頗曾注意 Thu lu hun 的讀法, 但他將“吐谷渾”追溯至詞根 *To'ol (舉蒙古語 toγol- “pass through”), 謂吐谷渾從遼東跋涉山川、度隴而至青海, 因此得名, 則純屬無根之談, 所擬形式亦違反蒙古語的演變規律, 見 Boodberg, “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 (1936), p. 182.

④ 《大正藏》第 54 冊, 編號 2128, 卷 77, 808c 頁。

二、Thu lu hun, Thu lu hūn

元封擦里巴萬戶 (Mtshal pa khri dpon) 司徒公哥朵兒只 (Si tu Kun dga' rdo rje / Dge ba'i blo gros, 1309-1364) 所作史書《紅冊》(Deb ther dmar po, 'Tshal pa'i deb ther) 引《唐書·吐蕃傳》(thang shu thu han zhes pa rgya'i deb gter las) 叙侵占吐谷渾一事作 thu lu hun bcom nas zung ce'ur sleb^⑤, 並於“唐蕃史事”篇末云:

rgya bod kyi lo rgyus'di tha'i dzung gi dus kyi yig tshang pa ba su khyi zhes pas brtsams/ phyis han gswi'u tshas bsdus te sdebs/ rgya'i lo tsū ba/ hu gyang jus shing mo bya lo la shing kun tu bsgyur/ bla ma rin chen grags gu shris shing mo glang la bod yig tu spar du btab bo//di'i lo'i dbang thang nor ba 'ga' re snang/ thu lu hun hor ser yin/'u then o thon yin/ bod kyi rgyal rabs dang pha cher mthun pa la'di zhib par snang ba che long zhig'dir bris te rgya bod gnyis yang yang'khrugs pa dang/ res 'ga' mthun zhing skyes dang dus kyi mchod pa bskur res byas pa la sogs zhib par thang zhu thu hyen'chang nyid du lta'o//^⑥

此唐蕃歷史是 [唐] 太宗時檔案官名為 Ba su khyi 者撰寫, 後由 Han gswi'u tsha 編輯, 漢地譯師 Hu gyang ju 在“木陰雞”(1285)年譯於臨洮 (Shing kun), 喇嘛華真吃刺思國師在“木陰牛”(1325)年以蕃字付梓。此中五行歲紀容有差謬。Thu lu hun 即 Hor ser, 'U then 即 O thon。吐蕃王統世系與此相合者似瑣碎, 此處祇能大略書之。唐蕃屢屢衝突, 時或和好, 其往來賜贈之細節, 應看《唐書·吐蕃傳》(Thang zhu thu hyen'chang)^⑦。

按 Ba su khyi 三字, ba 涉前一字 pa 而衍^⑧, Su khyi 是“宋祁”的音譯, 河西一帶

⑤ 東嘎·洛桑赤列 (Dung dkar Blo bzang'phrin las) 校注 *Deb ther dmar po*,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3 年, 17 頁。G·yas ru Stag tshang pa Dpal'byor bzang po (15 世紀), *Rgya bod kyi yig tshang mkhas pa dga' byed chen mo'dzam gling gsal ba'i me long* (《漢蕃册府智者大歡筵瞻部洲明鑑》, 簡稱《漢蕃册府》) 亦引《唐書·吐蕃傳》(thang shu thu hwan zhes pa/ rgya'i deb ther las) 叙同一事件作 **thu lu hun** bcom ste bzung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06, 107 頁)。Sa sky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1312-1375), *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 (《王統明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年, 229 頁引“漢地大史書《唐書·吐蕃傳》”(rgya'i deb ther chen po zhu thu han chan bya ba) 作 **thu lu hūn** gyi yul'joms [...]。按 zhu thu han chan 前脫一 thang 字, 亦為“唐書吐蕃傳”五字之譯音, 清雍正、乾隆時蒙古族藏文學者工布查布 (Gombo'Jab) 亦引之: rgya nag gi deb ther zhu thu han chan byar/ bcom ldan'das mya ngan las'das nas lo stong dang lnga brgya re drug (re dgu yin'dra) 'das pa na thang gi rgyal po byung zhes bshad/ “漢地史籍《唐書·吐蕃傳》中注釋云: 當佛滅度後千五百六十六(似當為六十九)年而唐朝皇帝出。”工布查布所引乃是藏譯本《唐書·吐蕃傳》中所附注釋。近有將 zhu thu han chan 還譯為“《如圖含籤》”者, 誤, 見漢藏文合璧本 Mgon po skyabs, *Rgya nag chos'byung* (Blo bzang bstan'dzin gyis bsgyur),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05 年, 30, 203 頁。參看曾比較托忒文 (Kalmyk) 譯本的庫茲涅左夫 (B. I. Kuznetsov) 所刊校的藏文拉丁字母轉寫本 *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 Scripta Tibetana I, Leiden: E. J. Brill, 1966, p. 186。

⑥ *Deb ther dmar po*, 24 頁。參看《王統明鑑》, 232 頁: rgya bod lo rgyus deb ther'di/ rgya nag tha'i dzung rgyal po'i dus kyi yig mkhan su khyi han gyis bsgrigs pa las rim pa bzhin du bcos te/ dus physis rgya'i lo tstsha ba 'u kyang dzus/ shing khun sde chen du bod skad du bsgyur ba la/ lo grangs mi mthun pa 'ga' re dang de dus kyi mi'i ming rnam la'dra min re'dug na'ang bla ma gu shri rin chen grags rgya yul na bzhugs dus/ rgya bod kyi'brel tshul'di rnam gtan tshigs su bzhed nas/ shing mo bya'i lo la shing kun sde chen du par du btab ste kun la rgyas par mdzad pa yin no//

⑦ 參看《漢蕃册府》, 114 頁: zhib par/ rgya'i yig tshang thang zhu hu then/ mtshan nyid la sogs par lta'o//

⑧ 《王統明鑑》無 ba 字 (因 yig tshang pa 一詞在該書中由 yig mkhan 所代替, 遂不衍 ba 字), 但刊落 han gswi'u tsha 一人 (《漢蕃册府》作 han se'u tsha), 而以 han 上屬 su khyi, 乃成 su khyi han, 見注 6。

方音脫落 -ŋ 收聲，故譯“宋”為 su；而 Han gswi'u tsha 為“范秀才”（范鎮）。唐太宗負盛名，異族作者喜言某人為唐太宗時人，其誤不足辨。至於 Hu gyang ju^⑨，則 gyang ju 為漢文“講主”之音譯（佛門中有譯主、講主、律主乃至韻主），如依當日稱謂習慣，Hu（福？）必為此僧法號之下字。是書謂吐谷渾即 Hor ser^⑩，未見諸現存漢文史籍。藏文 Hor 指回鶻^⑪，ser 是黃色的意思，Hor ser 或係 Sarīy Uyγur（黃回鶻，黃頭回紇，《元史·雪不台傳》、〈速不台傳〉作“馭 [撒] 里畏兀”）。契丹、西夏時期，黃頭回紇居於青海以北，吐蕃、西夏之間的地區。’U then 為漢文“于闐”音譯，O thon 即《元史·世祖本紀》之斡端，譯自蒙古語。

Hu gyang ju 身為講主和尚，躬預講肆，兼任譯事，在甘肅臨洮譯《吐蕃傳》為藏文，很可能是西夏人。“蕃”讀若“藩”，不讀“播”，所以寫作 han/hwan 或 hyen，後者是 hwen 的誤寫，鐫板墨印質量不佳時，藏文附加字符 wa zur 與 ya btags 極易混淆。講主將《吐蕃傳》中的“吐谷渾”讀為 Thu lu hun，若謂 lu 為 yu 之誤，未免武斷太甚，倒是 lu 與 ’u 形近，這方是伯希和依違於 *Tu’uγun 與 *Tuyuγun 之間的隱衷，復求照應“谷”（*kuk，比較突厥語“噉欲谷” Tonyuquq）字音“欲”（*iuk）的漢文舊注，遂又添上一個 *Tu’uγ-γun（Tuyuγ-γun），可謂彌縫周至，葦以加矣！但是，在藏文中，兩字之間點開的 thu’u 應是 *tuγu 的對音，既然是譯自漢文，怎會產生這種形式呢？慮及此一矛盾，我們承認藏文各本均作 Thu lu hun 之事實，承認其自足的史料價值，承認其拼寫反映當時當地的一種讀音，尋出這種讀音背後可能存在的理由：

(1) 吐谷渾原從鮮卑遷出，有“阿柴虜”之稱，“虜”即“匈奴”一名中“奴”之異

⑨ 《漢蕃冊府》作 Ba hu gyang ju（Ba 涉前 ba 字而衍），《王統明鑑》作 ’U kyang dzu，藏文 ’U 即 Hu 之異寫。Dan Martin, Yael Bentor, *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London: Serindia, 1997, p. 51 在著錄“Rgya nag po’i yig tshang (= Rgya’i deb ther rnying pa)”一書（按：恐怕是漢文舊史，並不存在這樣一部藏文著作，參看本文注 39）條目下未能裁定 Ba-hu-gyang-ju（’U-gyang-dzu, Ba’u-gyang-ju）一名的正確形式。

⑩ 《王統明鑑》229 頁選作 hor ser thu lu hun。

⑪ 藏人曾以蒙古源出回鶻，故藏文亦稱蒙古為 Hor，例如苯教史籍（Khyung po Blo gros rgyal mtshan, *Rgya rabs bon gyi’byung gnas*）謂成吉思汗（Jing gir < 波斯文 jahāngār “世界征服者”）係回鶻“驢耳”王的妃子（Yu gur gyi rgyal po bong rna bya ba’i btsun mo）所生（Khedup Gyatso, *Three Sources for a History of Bon*, Dolanji: Tibetan Bonpo Monastic Center, 1974, fol. 89. Cf. Hoong Teik Toh, “Some Classical Malay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being Sino-Platonic Papers* 13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pp. 37-38. 按該處藏文英譯有誤，借此更正，並誌作文求速失照之過）。在藏史《紅冊》中，“驢耳”王成了唐朝武后的兒子，《紅冊》之文可能得自薩八刺（參看本文注 40），已摻合回回藝人講說的故事，故事不止一種版本，十六世紀初波斯文著作即以“驢耳”王為漢朝呂后所生（Hoong Teik Toh, *op. cit.*）。鄂爾多斯（Ordos）蒙古薩囊徹辰（Saγang Sečen）《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zi*）叙女真人朱哥（Jüge）以數萬車載寶貨歸大都，漢兵伏車中以入，遂取其城，全是希臘“木馬屠城計”的翻版（參看拙文《“演揲兒”為回鶻語考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一輯，252 頁），而《紅冊》32 頁則將大都的失陷歸咎於 sog po’i mi dpon “色目人官吏”之叛變。希臘故事是隨回回人而東來，逐漸形成各種版本的“歷史”敘述。按藏文 sog po 原指粟特人，而藏文佛教史籍每將 sog po 用作突厥人（古藏文 dru gu，于闐文 ttrūk-）之稱（蓋突厥內部多有粟特等中亞雜胡，參看本文“附論”）。估計在黑韓王朝以後，sog po 一度泛指中亞回回與色目人，至明朝中晚期由於一種“大蒙古”歷史思維的投射，反將隋唐時代的突厥一律“蒙古化”，於是藏文 sog po 又成了蒙古的代稱。工布查布在其藏文著作中將突厥“葉護”附會為蒙古語 yeke “大”之對譯（ye hu ni ye he zhes bya ba chen po’i skad dod yin ’dra’o），也是同一種思維的反映，見 Mgon po skyabs, *Rgya nag chos’byung*，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年，270 頁。